

古代如何制定国家安全战略

4月15日是国家安全日，国家安全和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安全战略”这一名词或概念，但是却具有这方面的实际内容。历代统治者及其智囊团从其长期根本利益出发，都十分注重维护国家的安全，致力于追求并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目标。

早在《周易·系辞下》中，就产生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基本认识。孔子更明确地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的安全主张。自此以降，“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便成为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的中心命题，如明代永乐皇帝就一再强调“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三）。而谋划国家安全的构想，确定国家安全的方针，制定并落实国家安全的措施，即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

采取严密措施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第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以皇帝为最高主宰的专制集权体制，这就是所谓的“尊天子，一制度”。其基本内容是由皇帝独揽国家最高权力，并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完备的官僚办事机构，如秦汉的三公九卿体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与中央官僚体制相一致，在地方也先后设立郡县（州县）二级或道（省）府（州）县三级的行政体制，以确保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统一，政令军令的畅通无阻。

第二是控制军权，以文制武。自战国起，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呼

应，军权也开始高度集中，君主对军权的控制大大加强，出现了人事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等，以保证政治上的安全。

第三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创造条件。经济是一切问题的基础，要保持政治上的安全局面，巩固国防，离不开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对此历史上的明君贤相都有明确的认识，“仓廩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母以固守”（《管子·重令》）。有鉴于此，他们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扩充实力，或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为从事再生产创造条件；或实行盐铁官营，由国家牢牢控制重要的经济命脉；或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以确立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活动导向。通过这些措施，使国家经济实力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造就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有此为后盾，则政治安全、国防建设方可落到实处。

第四是抑制权臣，打击豪强，消弭潜在的分裂动乱因素。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通常能清醒意识到强藩、权臣、贵戚乃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是天子“大一统”的对立面，稍加纵容，就容易引发政局的动乱，若此，则政治安全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总采取各种措施，“弱臣势”，以防止权臣秉政、皇权旁落的情况发生。汉武帝实施“推恩令”，武则天打击关陇军功贵族，宋太祖推行“杯酒释兵权”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事例。

另外，对地方豪强势力，统治者也处处予以抑制、打击，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将其迁徙到京都一带就近加以控制，像秦始皇迁徙关东六国贵族至咸阳，汉高祖、汉武帝等迁徙“郡国豪杰”于关中地区，都属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举措。

重视军队建设 保障统治者的权益

第一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支富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军队是国家专政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古人认为：“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子·七患》）。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始终重视军队的建设，使之能够抵御外敌，平息内乱，维护安全，巩固统治。如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从而为夺取全面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第二是按照确保国家安全的原则，制定和落实军事发展的战略方针，使军队建设更好地服从于政治安全的要求。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是确立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基本格局，同时致力于贯彻优先发展中央军与正规武装的方针。在军事布局方面，是实行强本弱枝、“居重驭轻”和互相维系的原则，把驻防重心放置在京畿等政治中心地区。唐初的折冲府主要驻扎于关中，清代的八旗兵重点布防于京师，均是明证。

第三是有重点地加强军事领域的“软”“硬”件建设，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安全所提出的各种需求。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有意识地改善军事交通状况，兴修驰道（直道），这在秦汉与隋唐时期均有切实的举措。如秦始皇在位期间，由大将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

谷，千八百里”（《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它的开辟，使京师咸阳和北部边关联结在一起，平时边地军民屯垦耕作；一旦有警，长城戍卒点燃烽火，将领便可根据敌情作出部署，且可沿直道征调内地部队驰援，这样就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第四是着力于边地军事建设，屯田实边，拒敌于边关，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平。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全，是国防中的要务之一，唐代陆贽对此的论述，反映了人们的共识：“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国防，莫重于此”（《陆宣公奏议》卷二）。所以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将加强边地军事建设列为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屯田实边，健全边防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

统一思想认识 营造安全稳定氛围

思想的统一，文化的认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唯有思想文化的一致，才能牢固地建立起凝聚全民的精神纽带，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大业，消弭异端，根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历史上的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普遍在统一思想方面进行努力，把它作为制定和实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秦始皇禁止诸子百家之学，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统治者鼓吹理学，颁行“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钦定读物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应该说，这种统一思想的举措，其意义是正负参半的：它使人们思想定于一尊，在一定时间内是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的，但它的文化专制实质，同时也起到了钳制思想、窒息学术的副作用，从长远看，对国家的真正安全也不无弊端。

据《山西农民报》

历史文化

2000多年前的“高压锅”长啥样



熊足铜鼎



熊足铜鼎（局部）

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这些如雷贯耳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那就是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陵山的满城汉墓。除了这些，这里还出土了一口2000多年前的“高压锅”——熊足铜鼎。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绡之墓，有“天下第一崖墓”之称。河北博物院社教部李雅雯介绍，满城汉墓出土大量与饮食、烹饪有关器物，如鼎、釜、镬等炊器；壶、杯、罍等酒器等，不仅造型精美，制作精良，而且设计科学，其中就包括一件构思巧妙的熊足铜鼎，被称为“古代的高压锅”。

熊足铜鼎通高18.1厘米，口径17.2厘米，腹径20厘米，出土于满城汉墓1号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器身呈椭圆球形，鼎的三足为蹲立状的小熊。小熊作蹲立状，双眼圆睁，咧口微笑，模样十分娇憨可爱。鼎腹两侧各附一长方形竖耳，鼎耳上各有一只伏卧的兽。鼎耳穿轴，轴穿

过伏兽的臀部，使它可以绕轴翻转。鼎盖则像一只倒扣的钵，顶盖微鼓，上面等间距地环立着四个小兽。合盖前，先将鼎耳上的小兽掀开；合盖后，将它翻过来扣在盖上，再旋动鼎盖，使伏兽的背正卡在立兽颌下，鼎盖随之被闭锁起来，与现代高压锅极为类似。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铜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铜鼎最原始的作用，是炖煮和盛放肉类，相当于现在的锅。

李雅雯介绍，2000多年前的古人凭借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设计出的这种闭锁结构类似于现代的高压锅，设计之科学、构思之精巧，着实令人赞叹。

据史料记载，汉代皇帝拥有庞大的饮食服务管理体系，除了专门管理不同门类食物的官吏之外，当然还有大量奢华富丽的饮食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设计出如此构思精巧的熊足铜鼎了。

据新华社

古人怎样称金银

今天，人们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曾几何时，出门在外，要各种费心思看护随身盘缠，还要用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兑换钱钞，达成交易，这也就催生了种种专门的工具。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称金银呢？

戥子 专门用来称银子的小秤

戥（d ě ng）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称重计量工具。清人钱大昕谓：“等子所以称物者，俗作‘戥’”。在广州岭南金融博物馆收藏的戥子由两部分组成：戥称和外封装。戥子的木质封装，呈长葫芦状，尖端有活结，方便开启以取用内部的戥称。内部的戥称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戥杆、戥盘、戥砣（或叫戥锤），其实就是一个小巧的杆秤。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戥子，戥杆材质是动物骨，推测为骆驼骨或象牙，刻有标尺；戥盘为铜质，薄厚不等，盘边沿均匀地开了三个洞，用以系绳；戥砣（或叫戥锤）为铜质，初步推测为黄铜。看似简单的设计，其实讲究颇多。戥子称量东西，首要准确精密，所以戥杆必须纤细、轻盈又平直、均匀，骆驼腿骨质地坚实而气孔少，成为旧时制杆材料的首选之一。

直至清代，很多地方还是银铤和铜钱两种货币通用，所以商业人士一般会随身携带一个装着戥子的小盒，收到碎银子用戥子来称量，等攒到一定分量再熔铸成银铤。《红楼梦》里有一段讲到晴雯偶感风寒，请了大夫诊治。因平日里管账的大丫头袭人不



戥子

在，轮到麝月给钱时遇到了麻烦，“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管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是一两的星儿？’”从中可以看出，没有戥子的帮助，要给一两银子的诊金，也是麻烦的。

古代戥秤保存下来较早的，有明代万历年间的实物，造型与现代戥秤接近。这两支戥秤的分度数都格外多，这是相对精度高的一种体现。但分度过多也会降低秤的分辨力。明代白银已成为法定的流通货币，戥子和其他不同大小的杆秤构成了商品交易的成套称量体系。

天平和算盘 做“大买卖”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中国，天平很早就出现了。其中比较多出土的，包括战国时期的不少天平，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楚国的范围内，数量更是不小。据考古学家高至喜的统计，仅现在湖南的长沙、常德、衡阳等地区，从1949年到1972年，就在101座楚墓中出土过天平和砣码，由此可见当时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使用非常普遍的工具了。

算盘也是古人出门谈生意需要带的工具之一。大商号、大银号交易数量很大，会用到特制的长算盘，或通常放置于钱庄柜台，一分为二供店小二使用。而当店家出门谈个小生意，以便携为主，也出现了与戥子大小相近的小算盘。

算盘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不算久，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算账还是习惯拨拉算盘珠。今天在很多店铺中，收银台也会摆巨大的算盘珠作为装饰品，寓意财源滚滚、分毫不差。



天平和砣码

学校里也有些开设了算盘兴趣班或者小课程。从日用的角度来说，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算盘快且准，的确是伟大的发明。

据《广州日报》



算盘

名画欣赏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令人遐想无限。在浩瀚的中国文学艺术史中，处处可见吟咏和赞美春天的经典诗句。古人游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观赏山川风光、游览各地名胜古迹、骑马狩猎、泛舟游湖、秋千蹴鞠、沐风采花……无不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而中国画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国民族传统绘画，无疑也记录和描绘了这些对春天的遐想。那么在古代的中国绘画里，那些优秀的经典作品是怎样描绘和记录春天的景象呢？

《游春图》现存最古的画卷

中国绘画史上有关“游春图”最经典的作品，隋朝画家展子虔《游春图》无疑是其中之一。这幅中国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画上并无作者的名款和印章，因宋徽宗赵佶在隔水处题有“展子虔游春图”而得名。《游春图》描绘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贵人仕女外出春游踏青。江南早春，树叶吐绿桃杏争芳，水面宽阔微波泛起，有游艇轻泛。两岸游人三三两成群，沿途观赏春景，或步行伫立，或主骑马而仆随后。小桥连岸，坡后有农舍，而山谷中则寺庙隐现。画家运用细而有力的线条勾画出物象的轮廓，人物虽然小如豆粒，但一丝不苟，形态毕现。作品色彩浓丽厚重，山石树木均以矿物制成的石青、石绿颜料赋色，以青绿色彩为主调。整幅



《春耕草堂图》

禹之鼎 作

香车与丝骑 风静亦生尘

中国画中的游春人



《游春图》

展子虔 作

画作亮丽的色彩，充分衬托出祖国大好河山盎然勃发的春天气息。这幅流传有序、著录翔实的珍贵古画，充分展示了中国唐代早期山水画的面貌，不仅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虢国夫人游春图》绘盛唐风貌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画家张萱的经典代表作，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画描绘了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携其侍从春游的场景。画作着重人物内心刻画，通过劲细线描和色调敷设，浓艳而不失其秀雅，精工而不板滞。全画构图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与马的动势舒缓从容，正应游春主题。画家不著背景，只以湿笔点出斑斑草色以突出人物，意境空濛清新。图中用线纤细，圆润秀劲，在劲力中透着妩媚。

设色典雅富丽，具装饰意味，格调活泼明快。画面上洋溢着雍容、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

《八达游春图》骑骏马踏青景象

《八达游春图》是五代时期赵鼎（y á n）的作品，描绘八名衣冠华贵的男子，身穿唐代红、紫、绿色之官服骑着骏马春游的场景。他们或回首召唤，或挥鞭促行，人物神态和动作各不相同，相互间又顾盼联系。马蹄急促，好似踏着春风，欢快轻盈。苑林中垂柳依依，草木新绿旺盛，一灵石玲珑剔透直插天空。据考证，《八达游春图》画面中这八位骑马的达官贵人，身着红、紫、绿三色衣物，符合唐代流传下来的衣冠制度，而梁代正是依循唐制。由于梁太祖正好有八个儿子，因此可以推断，身为驸马的赵昣有可能描绘的就是这八个皇室子弟。

《春耕草堂图》乡村春耕一片繁忙

“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春晴。”这是清代文学家姚鼐（n à i）《山行》中的诗句，描写了乡村春耕时节一派繁忙景象。民以食为天，食从耕中来。春耕对农耕社会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平常百姓，都把春耕生产当成一年当中头等的大事。湖南博物馆珍藏



《八达游春图》

赵 鼎 作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张 萱 作

的清代康熙年间著名画家禹之鼎的《春耕草堂图》，就给世人呈现了一幅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农事正忙的景象。画面中的远处是连片的桃林，众多桃花开满枝头，像是挂上一层粉红彩霞，绚丽灿烂。近处左右两株垂柳缀着嫩绿叶子，微风吹来婆娑起舞。画卷左侧城墙脚下，两株葱茏古树掩映着三间乡村农舍，舍前一位老翁头戴斗笠，身着蓝衫，右手捻须，人物形态极为传神。旁有两童侍立，一童持杖，一童背书卷，正面对面窃窃私语。右侧远处，一农夫在田中赶牛辛勤耕作，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整幅画面充满着乡间田野的生活气息。该画敷色清新明亮，构图严谨，疏密有致，笔法飘逸流畅，人物神情颇为生动传神。画家无论是在构图、笔墨技法，还是敷色染彩上都体现出极深的造诣。

据《西安晚报》